

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学分析

——评天野郁夫的《日本高等教育结构》

史朝 邬大光

本世纪 60 年代之后,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用多种方法研究高等教育已成为一种趋势。其中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尤其引人注目,其代表人物有本·戴维(Joseph Ben-David)、马丁·特罗(Martin A. Trow)、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等。日本的天野郁夫则是一位后起之秀,他从 70 年代开始,在翻译国外著名高等教育理论著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对日本高等教育的深入研究。他在系列著作《变革时期的大学》(1980 年)、《大学——试练的时代》(1988 年)、《探究日本的大学》(1990 年)、以及《日本高等教育结构》(1986 年)中,借鉴阿什比和特罗的理论,分析研究了日本的高等教育结构在外国高等教育模式影响下的形成过程。其中,作为其代表作的《日本高等教育结构》(以下简称《结构》)一书,在这方面尤其见长。该书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演变过程,提出在 19 世纪的“二元二层结构”是现代日本高等教育体制之基础的观点和现代日本大学的分类理论等,不仅在日本而且在整个国际教育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也正处于一个大发展时期,研究《结构》一书,可以从中得到很多借鉴。概括起来,天野郁夫在该书中主要论述了以下 4 个方面的内容。

一、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构分析

60 年代末期,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理论家马丁·特罗提出了有名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主要内容是把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英才”、“大众”和“普及”3 个阶段。他认为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都遵循这一理论。他还具体提出了表明高等教育从英才阶段走向大众化阶段的量化指标,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占同龄人口的比例达到 15%。天野郁夫运用马丁·特罗的理论研究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他认为,1966 年日本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与同龄人口的比例已超过 15%,这就是说,日本已在美国和加拿大之后,率先于欧洲各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①

天野郁夫指出,高等教育这种数量上的发展速度与 GN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密切相关。因为,GNP 的增长一方面通过社会或家庭增加教育投资,从而增加了升学预备者的人数(称之为“推力”);另一方面因高学历者的雇佣机会进一步扩大,促进了高等教育人口的增加(称之为“拉力”)。但在这之外,高等教育的发展还有一条不依赖于 GNP 水准的、相对独立的途径。即高等教育数量发展的可能性受教育结构、阶级结构、职业结构 3 者关系的左右。

史朝 国家高级教育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 邬大光 沈阳师范学院教科所教授、博士

著名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曾经就此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他认为高等教育数量上的发展要成为可能,必须具备以下3个条件。(1)近代大学的诞生先于强大而稳固的中产阶级形成;(2)高等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3)专门职业的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等教育。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社会拥有以强大而稳固的中产阶级为中心的阶级结构和以传统的专门职业位居顶层的职业结构,那么其高等教育结构就具有保守性,不易变化和扩充。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的职业结构是流动的,且高等教育在形成职业种类或者说在形成中产阶级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那么其高等教育结构就会成为升迁性流动的主要渠道,而且能够使新的高学历职业种类不断产生,并对这种职业结构的变动作出灵活的反应。^②这一观点虽有几分夸张,但它精辟地解释了高等教育数量上的发展为何在欧洲各国显得缓慢,而在“新兴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日本却能飞速进行的现象。

正是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天野郁夫分析了战后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教育结构、阶级结构和职业结构3者之间的关系。天野郁夫指出,在其它条件相等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数量的发展,受升学要求的强烈程度和满足升学要求所必备的经济能力(即教育经费负担能力)的制约,这种负担能力又为享受高等教育机会而必须交付的学费水准所左右。这样一来,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数量的发展并不是依靠国立大学教育机会的扩大,而是依赖于学费低廉且集中于大城市的私立大学的扩充。天野郁夫根据职业、学历、收入这3个指标所显示的数字,揭示了日本的阶级结构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第一,对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业层来说,大学已达到了普及化;第二,推动高等教育数量发展的是位于阶级结构中层各阶层的各阶层;第三,尽管高等教育数量上大大发展了,但下层阶级的升学机会仍然是狭窄、关闭着的。^③对日本高等教育与职业结构的关系,他认为日本高等教育在大正期(1911—1925)以后,人才培养职能和学部结构的重心从传统专门职业移向了白领职业群。但这些变化并非涉及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只有私学适应了社会的这一需要,以低廉的学费通过法、商、经济各学部为企业培养了大批职员。日本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够迅速走向大众化,原因就在于其私立大学具有培养大批白领的职能。尽管白领职业的需求量随经济变动而变化,日本从大正期到昭和初年(1926—1935)以及战后经济萧条期,大批文科毕业生未能就业,但由于白领职业群是一个向学历结构下层开放的广阔市场,因此,通过逐步蚕食低学历层的就业机会,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就业机会。而且,以高度的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职业结构的变化又接连不断地产生新的都市白领职业,使培养白领工人的学部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这样,日本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不仅产生了大量的高学历者,而且顺利地形成了新的学历与职业之间的关系。

二、日本高等教育的“二元二层结构”

天野郁夫在分析日本高等教育发展过程时,用得最多的是他提出的“二元二层结构”理论。这一理论的要点是,在19世纪后半叶日本着手构建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时,首先是仿效德国柏林大学的模式,建立了以培养国家统治型人才为目的的帝国大学。这是一种典型的“精英型”大学的翻版。但与此同时,在欧美各国,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对新型人才的需求,相对于以前的古典大学,出现了德国的工科大学、英国的市民大学和美国的赠地学院等“大众型”高等教育机构。为顺应这一趋势,满足广泛的社会需要,日本又创办了独特的专门学校,以对中下层子女进

行一种专业性的高等教育。这就是所谓的“二元二层结构”。大学与专门学校之间,在资源的分配、研究和教育设施、课程选修、毕业要求诸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作为这种“二元二层结构”的一部分,除了大学和专门学校之分外,还有官学和私学之分。以专门学校为例,官立和私立之间存在着显著区别(1)前者除农工商方面的实业专门学校外,还有外语、音乐等特殊专门学校。而后者除少数实业和医学专门学校外,大部分是法学、文学、宗教等方面的专门学校,其中法学方面的学生最多。(2)前者都是单科,而后者尤其是法学专门学校则增设了商业、经济、文学等专业。(3)前者招收正规的初中毕业生,提供本科教育课程。而后者则有不问入学资格的专科,并以此为办学中心,还设有包括预科在内的大学部。这样,在资源的分配、对社会需求的应变能力等方面,官立和私立两种学校都表现出极大差异。

天野郁夫通过大量的资料证明,作为日本高等教育“原型”的专门学校,是作为补充英才型大学的不足而发展起来。但在要求大学和专门学校并存的日本现代化的初期,这种补充性又具有不同于欧洲各国的独特之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日本投入高等教育的资源,如有能力对西欧的学术进行系统教育和研究的教师,具有学习这些内容所必备学历的学生,教育过程中所必需的资金等,都受到严重的限制。在这些因素制约下,政府只能采取资源倾斜分配和官学中心主义的政策,把资源重点投入以满足“富国强兵、殖产兴业”这种“国家之必需”为目的官学,尤其是帝国大学,使它们成为能与欧美大学相匹敌的高水平教育研究机构;同时,又通过专门学校的短学年、低消费和简易课程来满足广泛的升学要求和人才需求。可见,功能的补充并不是在大学和专门学校同一水平面上而是在纵向等级中进行的,同时解决质量和数量问题的要求导致了大学与专门学校之间多层次高等教育结构的形成。而这种结构的制度化,又正好符合日本社会当时职业结构的需要,使日本高等教育数量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化的迅速实现成为可能。

这种战前形成的官学中心和帝国大学优先的“二元二层结构”,在战后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中,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只不过是帝国大学——专门学校这根轴变成了中央国立大学——地方大学,高等教育的等级结构依然如故。

在这样的体制下,不仅在国立大学之间,以综合大学(中央大学)为中心的分配结构得到了制度化,甚至在一个大学内部,对各学部、各专业的预算分配也是固定不变的。私立大学内部也是这样,并且为提高质量而进行投资的款额也受到很大限制。在这些条件的制约下,不可能指望有大学之间的自由竞争,因而也就不可能建立一种流动的高等教育结构。

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天野郁夫将近代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总结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大学一高等学校和专门学校,进一步在官学和私学这一“二元二层结构”的基础上取得了发展。这同我国的现代化特质密不可分。如把引进、吸收西欧发达的科学、技术为使命的帝国大学,作为一种向上的高等教育。那么敏感适应社会需要,用日语进行学术、技术的教育和普及的专门学校,特别是私立专门学校则是一种向下的高等教育。”^④而正是由于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促进了日本高等教育以一种赶超型战略突现了大众化,并且形成了不同于欧美的发展模式。

三、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类型论”

70年代在国际高等教育理论界,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

反响。但特罗只以美国作为例子,巧妙地解释了美国高等教育为何能成功地从英才型转入大众型,而对欧洲各国大学的发展为什么没有进入大众化阶段,却没有作出正面回答。天野郁夫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通过比较美日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道路,提出了“制度类型论”。其中心观点是:美国有美国的道路,欧洲有欧洲的道路,因此,要说明以前的高等教育发展,进而预测今后的发展方向时,需要突破特罗理论的局限性,引入“制度类型论”,即各国高等教育可以“相应其类型的不同,设定阶段转移的多重道路”^⑧。

根据特罗的理论,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功能要顺利地由英才型进入大众型,必须在英才型阶段的高等教育体制中,并存着同英才型不同的大众型机构。在美国这种相应的机构是“赠地学院”;日本在战前,其“功能的对等物”是专门学校,尤其是私立专门学校;在战后则是以专门学校为中心合并的新制大学,特别是私立大学。因此,日本在战前就已具备了容易进行转移的制度结构,战后单轨制的新学制实行,新制高中制度的建立,就更促进了日本高等教育制度向大众化阶段的转移。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限制性中等教育的欧洲,在高等教育上同美日是绝对不同的类型。在美国各大学之间,为获得作为顾客的学生和研究人员而展开激烈竞争,即“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成为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推动力量。但在欧洲,不存在这样的“市场力量”,有的只是政府的力量和大学内部的逻辑发展。如阿什比所说,“在苏联,来自政府的力量最大;在欧洲一些国家,如英国和德国,则来自大学体系本身内在逻辑发展的力量最大”^⑨。

天野郁夫在分析了特罗理论的局限性之后指出:一国高等教育能否顺利发展,是否由英才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关键取决于该国高等教育创办时形成的“原型结构”。按照阿什比的说法,是大学继承谁的遗传物质,是变种还是杂交种。“随着占适龄人口在校生的比例上升,英才阶段欧洲各国的大学,在学生的意识、教育的形式、内容、方法、大学的社会功能等各方面,都要开始具有美国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特征”^⑩。若是这样的话,特罗的理论需要进一步发展,即相应各国高等教育类型的不同,可能设定高等教育阶段转移的多条道路。而日本的高等教育就是极为特殊的一个类型。

四、现代日本大学分类与高等教育结构

在对日本高等教育进行结构分析,提出了“二元二层结构”理论之后,天野郁夫又从大学评价的角度对日本高等教育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从研究职能、教育职能、选拔职能等多方面来进行大学分类的方法。而这种分类又往往和高等教育的结构密切联系在一起。

第一,大学分类的标准。天野郁夫仅以日本国立大学为对象设立了3个标准:(1)传统(前身学校的创设时间);(2)组织形态(讲座制、学科制或是大学院的有无);(3)教育机会的地区性(学生来源的地区构成)等。与此同时,他设定出了3个类型的大学:(1)中央大学计(10所);(2)全国大学计(10所);(3)地方大学计(54所)。如此分类的目的,在于综合分析国立大学群在制度上的构造。第二,大学分类的方法。确定标准之后,如何对日本庞大的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分类,仍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天野郁夫在借鉴美国大学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以研究职能的强弱来作为日本大学分类的主要依据。按照他的方法,日本的大学被分为5种类型^⑪。(1)研究大学(Research-R型)。属于此范畴的大学,仅限于那些研究职能特别强的大学:各系上面都设有博士课程的研究科;研究生与本科生之比国、公立应在9%以上,私立应在6%以上,医齿

学科的单科大学应在 20% 以上,此为基本标准。(2)研究生院大学(Doctorate Granting1—D1 型):全部或大多数系之中设有博士课程的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与本科生之比在基本标准之下的有学位授予权的大学。(3)准研究生院大学(Doctorate Granting2—D2 型):只有一部分系上面设有博士课程的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与本科学生之比在基本标准之下的有学位授予权的大学。(4)硕士大学(Master Granting—M 型):只有硕士课程研究科的大学。(5)本科大学(College—C 型)。只有系而没有研究生院的大学。

分类是一种主观的划分,而结构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无论从研究职能、教育职能还是选拔职能来看,日本高等教育等级制结构的影子到处可见。位居顶端的研究型大学,多数是历史悠久、创办较早的旧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庆应等名牌私立大学。这些大学不仅一直得到政府的倾斜性支持,而且在社会评价中也建立了崇高的威信。进入 80 年代后,随着改革的呼声日趋强烈和日本政府对教育改革的重视,通过大学评价重新确定大学的社会地位已成为一种趋势。但是人们长时间形成的观念,却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转变的。

五、几点评论

综上所述,天野郁夫的《结构》一书主要有如下几个特色。

第一,开辟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新途径。即将社会学的方法应用于高等教育研究,将高等教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层面。实际上,本·戴维、马丁·特罗,再加上天野郁夫和布迪厄,可以说是当代高等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奠基人。通过他们的一系列研究,高等教育社会学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二,《结构》虽是以日本为案例,但实质上是研究了整个近代世界高等教育史。如 19 世纪柏林大学的创办,如何影响了欧美大学的模式;美国和日本这些新型国家,为何率先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等。

第三,天野郁夫融合了各家理论,如特罗的“发展阶段论”理论,本·戴维的“学术中心论”,伯顿·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论”和阿什比的“高等教育的生态学”等观点,从而能够站在一种新的综合基础上,分析日本高等教育结构的形成、机制及发展趋势。虽然是一种个案研究,但对整个世界高教理论界都具有意义。

第四,理论研究结合实际,针对日本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如日本的高教结构为什么是“二元二层结构”,中央和地方大学的差别是如何形成的等等,对之溯本追源,进行深入的理论剖析。

注 释:

- ①②③④⑦ [日]天野郁夫:《日本高等教育结构》,玉川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8 页,第 158—163 页,第 57 页,第 12 页,第 18 页。
- ⑤ [日]喜多村和之:《论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阶段》,载广岛大学大学研究中心编:《大学论集》第 8 集,第 51—62 页。
- ⑥ [英]阿什比著,滕大春等译:《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 页。
- ⑧ [日]庆伊富长等编著,王桂等译:《大学评价—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2—74 页。